

# 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创建之因由

## ——百年征程中的党内监督机构探源

龚亲华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27年诞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之所以创建这一党内监督机构,主要原因和理由归于:深受列宁关于党内监督理论的影响,顺应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趋势,同时,也是完成中国革命重要任务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党内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自我革命;纪律建设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1)05-0007-0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的确,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自我监督,即使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仍不断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创建专门监督机构。1927年夏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用以加强党内监督,防止出现贪腐现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它的创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基础。在建党百年之际,探讨其创建的原因和理由,具有特别的意义。

### 一、深受列宁关于党内监督理论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党内监督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1927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建,就是深受列宁党内监督理论影响的产物。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苏联领导人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引导下实现的,这一经历使得中国共产党前期的政治体制无不打上了当时苏联的烙印。且建党之初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领导中国革命,争取民族解放。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一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sup>[1]</sup>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列宁国家监督理论的实践提供了可能”<sup>[2]</sup><sup>214</sup>。于是,列宁的党内监督理论,也深深地吸引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列宁党内监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义是实行国家监察与党内监察的统一,尤其强化党内监督,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接受全体党员的监督,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我们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机关内部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建立起来,这种机制“最能反映人民民主的本质”<sup>[3]</sup>。并且,在列宁的党内监督理论指导下,苏联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列宁的党内监督理论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效用让中国人民对列宁的监督理论极为信赖,并将其引进国内予以适用,同时效仿其相关制度。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第三条即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sup>[4]</sup><sup>105</sup>的明确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史实证明,1927年中共“五大”所启动的我国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建历程,从名称到体制等都效仿了当时的苏联,

**[收稿日期]**2021-07-16

**[作者简介]**龚亲华(1969—),男,湖南邵阳人,南京审计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派驻南京审计大学监察专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纪检监察。

这恰是受列宁党内监督理论影响的结果。

### 二、顺应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趋势

中国共产党乃先进纯洁的组织,它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sup>[5]90</sup>。但是如何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一道永恒课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确保共产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永远的“先锋”。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建一定意义上正是顺应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趋势。

在党组织创建之初,其纪律建设就已受到关注,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就已将党的组织纪律及党内监督机构予以明确,以此来约束党员的行为,规范党组织的活动。其中就党内监督机构,《党纲》第十条规定:“地方组织党员中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本地区之外去工作,但应受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sup>[4]107</sup>也即,党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遵守一条规则,那就是接受当地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而地方执行委员会并非“独享大权”,而是需要接受中央相应委员会的监督,这在《党纲》第十二条已明确:“地方委员会的经费、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sup>[4]107</sup>显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已明确了党内监督的要求。

党的“二大”基本沿用了“一大”的组织纪律,在党章议决案中提到:“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sup>[5]90</sup>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实行严密的组织纪律,才能够完成革命的任务。遗憾的是,“二大”所通过的决议里并未明确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本次会议出台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也仅提“纪律”,只字未提“党内监督”。到1923年6月党的“三大”文件指出:“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sup>[5]152</sup>这里仅要求党员在参与政治性活动时,需要接受严格监督和指导。无疑,党的“三大”关于“党内监督”是选择性,较“一大”有所弱化。这种监督弱化带来了党员素质的下降。根据1924年6月的《汉口地方报告》,此时的党员“虽共有四十七人,而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sup>[5]262</sup>。可见,缺少严格的党内监督,造成了组织纪律涣散,带来党员素质的下降。为汲取教训,党的“四大”力求弥补,在新修正的《党章》中规定,“凡党员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该地方委员会必须开除之”<sup>[5]388</sup>。只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并严格执行,才能根本维护党的良好形象。

概言之,党的“一大”开辟了“党内监督”的优良传统,“二大”则忽视了党内监督的力量,后来的“三大”、“四大”基本传承了一大的传统。而党的“五大”汲取“二大”的教训,顺应“一大”、“三大”、“四大”所形成的历史趋势,传承并发展了党内监督机制,创建了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恰是历史的进步。

### 三、完成中国革命重要任务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重要任务是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建,更是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现实需要。1927年,随着“四·一二”与“七·一五”等反革命事变的相继爆发,中国革命一度陷入低潮,这不得不引起中国共产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反思。为了渡过难关,拯救革命事业,共产党必须勇敢担责,审慎反思。因此,有必要在党内建立专门的纪律监督机关,作为党纪的执行机关,使党的纪律真正落到实处,确保革命事业成功。

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大增,根据史料,“截至1927年4月,全国共有党员数量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到50.8%”<sup>[6]188</sup>。但是,党员的质量却受到质疑。1927年2月,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从辛亥以来,一直处在革命状态之中……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那么,这应当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健康怎么样呢?”<sup>[7]14</sup>显然,他对

共产党的品质与能力产生了疑问,并且肯定:“我们党是有病……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sup>[7]14</sup>“我们应当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然后能够增强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持党在群众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sup>[7]15</sup>从这里,不难看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的确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及时矫正,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否则难以担负起完成中国革命的重任。

史实证明瞿秋白的判断和担忧不无道理。此前的革命失败,就与共产党领导不得力有关。有史记载:1925年10月的“天津唐山罢工之失败,当然原因甚为复杂,其中党的指挥不力也是一个原因。”<sup>[5]496</sup>由此,欲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加强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是关键,作为执行党纪的专门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建非常必要。

鉴于以上因由,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承担党内监督的大任。随后通过的新党章以“监察委员会”专章规定:中央与省级同设“监察委员会”,以“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为宗旨。学界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这一创新之举对于严肃党的纪律,加强作风建设,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sup>[7]421</sup>尽管后来该监察委员会被几易其名,但是它的价值却是永存的。今天,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意义由此足见。

综上,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深受列宁关于党内监督的理论影响,顺应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趋势,同时也是为了完成中国革命重要任务的现实需要。此外,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见证,由此起步,不断负重前行,取得辉煌成就。有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言:“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2]张晋藩. 中国近代监察制度与法制研究[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3]蔡定剑. 社会主义的监督理论及实践(上)[J]. 政法论坛,1989(1):12-19.  
 [4]一大回忆录[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5]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7]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大会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黄 燕]

## A Study on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Super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Probe into the Source of Inner-party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in the Hundred-year Journey

GONG Qinhu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inner-party supervi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an with the central supervision committee born in 1927. The main reasons for establishing this inner-party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at that time were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Lenin's inner-party supervision theory,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ompleting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inner-party supervision; Central Supervisory Committee; self-revolu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